

DOI 编码:10.19847/j. ISSN1008-2646.2023.02.002

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 与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

肖兰兰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全球气候治理掀起的碳中和潮流正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和变迁将带来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成为各国碳政治博弈的重要内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是一国基于自身所能运用的各种绿色资源,通过国家战略谋划和具体应用,维护和拓展国家绿色发展及国际碳政治博弈的能力,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向度。当前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增强国际话语权、提高制度建构力、增加国际道义力量、改善和优化国际形象等大大提升了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水平。人类正处于一个危机叠加、风险加剧的时代,需要中国继续通过首脑外交等各种国际战略途径加强自身绿色战略能力建设的同时,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碳中和;首脑外交;国家绿色战略能力

中图分类号:F113.3;D8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23)02-0007-09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中国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1]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已经将碳达峰和碳中和放到了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予以统筹推进,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已经意识到碳达峰和碳

中和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和系统影响,需要从碳政治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当今世界掀起的碳中和潮流。2019年以来,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呼吁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根据自身现实情况提出了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目标。与此同时,联合国高级气候倡导者发起了全球性的“奔向零碳”(Race to Zero)运动,逐步推动形成了一股全球性的净零排放(碳中和)潮流。^①这一潮流正在

收稿日期:2022-12-30

作者简介:肖兰兰(1979—),女,山东潍坊人,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基地研究人员,南京理工大学欧亚研究院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21BKS089)

本文引文格式:肖兰兰.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与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7-15.

^①截至目前,净零倡议联盟包括1 049个城市、67个地区、5 235家企业、441家最大投资者和1 039所高等教育机构等。这些“实体经济”参与者与120个国家组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联盟,致力于最迟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目前,这些参与者的总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近25%,占GDP的50%以上。具体参见:<https://unfccc.int/climate-action/race-to-zero-campaign>.

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预示着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对全球能源结构、产业分工和国际经贸规则等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引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和欧盟既是这场碳中和潮流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正在凭借其在低碳技术、资本和碳规则制定等方面的先发优势力图重塑未来经济发展。^[2]当然,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正在干扰美欧的碳中和努力,尤其是2022年2月以来发生的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美各国碳中和目标的实施力度,扰乱了欧美国家绿色能源转型的实施计划,如欧盟重启火电,新建化石能源基础设施,并在《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中纳入天然气,加大其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减排差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美国环保署设定的电力行业排放上限无效。若不能有效协调气候目标和各国能源目标的战略举措,新增的化石能源资产将可能陷入长期的碳锁定效应。而且,冲突导致传统安全和现实主义政治强势回归,给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欧盟的气候雄心和政治意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俄乌冲突重创欧盟经济,影响其能源转型节奏,区域内社会矛盾上升,短期内将导致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3]。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也为欧盟加快能源转型、摆脱对俄罗斯化石能源依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积极推动欧盟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所以,从长期来看,碳中和仍然被作为欧美促进能源转型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总目标。2022年5月18日,欧盟委员会正式通过REPowerEU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从40%提高到45%,这将使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到2030年达到1 236 GW,超过《欧洲绿色协议》“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下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1 067GW)。^[4]2022年8月16日,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了总价值为7 500亿美元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其中,投资3 69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助推美国温室气体减排在2030年达到40%,并提振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电动车以及关键矿物等投资与消费。^[5]总体来看,虽然俄乌冲突发生后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给本已疲软的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造成了更加困难的局面,但全球走向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的意愿和决

心并未动摇,甚至有强化之势,这从2022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以及近期欧美国家能源和经济领域的行动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全球碳中和目标角逐背后所隐含的科技和产业革命较量以及碳政治博弈的意蕴依然存在,碳中和潮流引发的地缘政治重构将因俄乌冲突的冲击而变得更加复杂。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对内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对外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调动自身各种绿色资源,最终转化为国家参与低碳博弈的能力,将越来越突出和重要。本文把国家的这种绿色应对能力称为绿色战略能力。未来30~40年的时间(2050年全球实现碳中和的预期)是世界各国碳政治博弈加剧的关键时期,也必将各国绿色战略能力大比拼的关键时期。因此,加强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提升中国在未来绿色发展和国际碳政治中的竞争力将变得至关重要。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加入和顺应这一全球性的碳中和潮流,并在国际碳政治博弈中积极加强自身绿色战略能力建设。自2020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明确提出碳中和目标以来,碳中和就成为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关键词汇和核心背景,成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举措,成为当前中国首脑外交的重要议题。习近平几乎在每个重要的国际场合都强调或阐明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和政策行动,这既是对中国推动碳中和潮流政治意愿的表达,又是加强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的重要方式。可以说,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在提升中国绿色战略能力建设方面正在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碳中和背景下首脑外交与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的内涵界定

冷战结束后,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现代交通、通信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政治首脑参与外交活动的数量和频度不断增加,首脑外交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出来。

1. 首脑外交的基本内涵

首脑外交(summit diplomacy)也称元首外交,顾名思义就是指国家或政府最高政治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外交活动。具体内涵包括以下三点:(1)对一国而言,究竟哪些人算是首脑,首脑外交的主体指涉范围到底有哪些。一般而言,政治首脑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掌握

着国家最高行政权的行政首长。在政治现代化不断深化的今天,除了极个别国家,大多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有明确的宪法规定和清晰的权限划分。(2)政治首脑参与外交的方式和范围,即哪些外交行为才算是首脑外交。一般而言,只要能够体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真实意志的外交行为都可以算是首脑外交。除了政治首脑亲自直接参与的外交外,委派特使、致以书面或口头声明、互相通信、通话等形式参与的外交活动,都属于首脑外交。(3)对政治首脑参与的哪些活动才算是首脑外交,即对首脑参与政治活动性质的界定。首脑外交必须是国家外交或对外政策中的官方活动,代表着国家主权和国家意志。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把首脑外交界定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最高领导人为推动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服务国家利益,直接参与或委派代表实施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活动,包括通过信件、电报、热线电话等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通信,任命特使,互访和多边会晤,参加最高级会议,发表外交宣言和声明等。

2. 碳中和背景下首脑外交的特殊功能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气候问题进入国际谈判议程以来,因应对气候变化而衍生的碳政治就成为各国博弈的重要内容,并成为首脑外交的重要议题。与一般的外交活动相比,首脑外交可以更加直观地把国家的碳政治立场清晰表现出来,并以国家最高政治级别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从而对内和对外都有助于进行政治动员,以便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从而提升该国的绿色战略能力和话语权。

首先,首脑外交可以保持气候议题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议程中的较高凸显度。首脑外交是受关注程度最高的外交形态,政治首脑处于权力和责任的中心,首脑外交地位特殊,外交行动举世瞩目。尤其是在大众传媒时代,首脑外交的几乎每一个动作都被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下。首脑外交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和推动,无疑将加强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让气候问题从议题纷繁和问题众多的议程中凸显出来,进入高级政治范畴,从而凝聚全人类力量更加有效应对。

其次,首脑外交可以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和行动力度得到最高政治推动。政治首脑既是一国内外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也是一国外交的

首席外交官,首脑的政治地位决定了首脑外交是国家之间处理重大问题的最权威途径。虽然首脑外交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可能完全取代专业外交官,有些技术性的问题也并非首脑外交所能解决,但首脑的最高政治权威决定了首脑外交可以把气候变化议题置于国家或国际议程中的较高位置,无论对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协议的达成还是协议达成后国际国内履约都起到最为直接和有利的推动作用。

再次,首脑外交可以提升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可信度和透明性。作为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威,政治首脑在国际场合的公开承诺和发言都带有很强的隐性约束力。政治首脑在国际场合对碳中和目标和气候政策的承诺和宣示,一方面向国际社会或特定外交对象展示其自身行动意愿和决心,让国际社会对自身行为预期有良好的判断;另一方面,也通过将自身承诺和行动暴露在聚光灯下从而增加其履约的外在规制性,进而增加该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言行的可信度和透明性。

最后,首脑外交有助于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和政治信任,从而有助于促进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协议的贯彻和落实。首脑外交具有最高的政治保障作用,无论是在多边外交框架还是在双边外交框架,首脑外交都是最为严肃和严格的国际活动,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尽管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政治首脑最终还要面对国内其他国家职能部门的约束和限制,但首脑外交对气候问题的协商和谈判本身就互相传递了最高的政治立场,有助于澄清误解和疑虑,增进国际共识和政治互信,从而最终有助于国际协议的达成及其实施。

3. 国家绿色战略能力的内涵及其界定

战略能力是为国家组织、协调和运用国内外各种战略力量,预防和应对各种重大威胁,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能力。^[6]基于此,本文把国家绿色战略能力界定为一国基于自身所能运用的各种绿色资源,通过国家战略谋划和具体应用,维护和拓展国家绿色发展及国际碳政治博弈的能力。鉴于碳中和行动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系统性影响,绿色战略能力作为国家参与和适应国际碳政治博弈的能力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一国内政与外交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从指涉对象来看,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可分为

个特点。

第一,呈现高频次运作、数量激增的态势。自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碳中和目标以来,积极推进和落实碳中和目标成为中国首脑外交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12月,两年多的时间,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公开场合阐述和提及碳中和、低碳发展、绿色发展以及产业及能源结构转型等相关议题次数就达到23次,其中双边层面的外交5次,多边层面的外交9次,全球层面的外交达到9次。虽然每次首脑外交的议题可能存在多个,但积极落实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净零排放始终是中国首脑外交的“题中之义”。

第二,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升。中国不仅在双边、多边和全球层面明确承诺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而且努力把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路径和方式暴露在国际社会的聚光灯和外在约束之下,凸显了中国努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和落实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正如习近平在2021年5月6日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指出,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的时间,这是中方主动作为,而不是被动为之。^[7]中国通过首脑外交向世界传递的这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履约和践行碳中和目标的决心和意愿,不仅体现了中国要继续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和担当,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

第三,理念供给“外溢性”不断增强。长期以来,全球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实力相对不足,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力和理念供给比较薄弱。碳中和背景下首脑外交,不仅向世界展示中国积极应对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和举措,而且把中国国内践行和落实碳中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背后的理念因素不断向世界传达。通过首脑外交,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代表中国生态智慧和文化的理念不断走向世界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认可。

第四,综合影响力不断上升。首脑外交是最需要从战略高度予以谋划和设计的外交,对外议题的设置有着十分重要的讲究和综合考量,既要结合中国自身的利益需求,也要考虑外交对象的利益关切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把碳中和议题置于整个首脑外交的核心位置,并积极主动予以强调和阐释,这说明中国对碳政治相关议题的掌控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有了显著提升,而且由于碳中和与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绿色复苏、生物多样性损失等议题密切相关,首脑外交也围绕这些议题展开,反映出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等更加宏观议题的综合影响力不断上升。正如习近平2022年1月24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行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中国要“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议程和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8]

四、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在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随着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引发的对国家传统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颠覆及带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中国急需在激烈的国际碳政治博弈中发挥战略主动,占据优势地位。基于此,中国对内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深入推进碳中和目标;对外要加强战略谋划,通过首脑外交在内的各种途径把国家的绿色资源和外交行动密切结合起来,更好地转化为国家绿色战略能力。一般来说,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主要从四个维度作用于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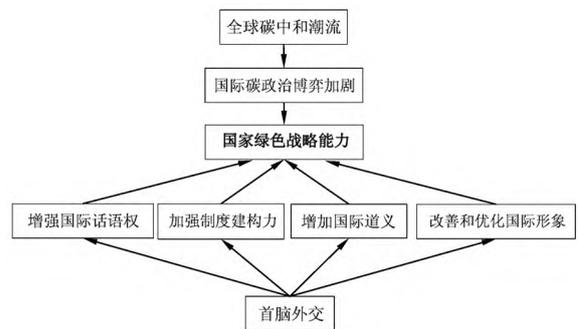


图2 碳中和背景下首脑外交作用于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的示意图

1. 首脑外交大大增强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博弈中的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通过自身对外话

语体系影响其他国家行动或认知的能力”。^[9]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科学与理念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认知不断深化并朝着越来越具有确定性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维护全球公共利益与国家自我利益的动态平衡,对气候问题的国际责任认定、利益分配、治理方式及政策选择等仍然是非常政治化的问题,需要国际层面上的谈判博弈和讨价还价。就此而言,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了话语权竞争和博弈的过程,“一个国家若能掌握国际气候话语权,就有可能使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或结果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10]

首脑外交实质上就是国家政治理念和话语的对外宣示和传播。通过首脑外交,中国领导人不断推出一些关于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建议和新方案,向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的政治话语和政治理念,大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比如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明确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这些政治话语以及这些话语所包含的星球意识和地球家园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改革和建设提供了动力和方向。

首脑外交也是最具有政治关注度的外交形式,通过首脑外交可以让国际社会更加直观和深入了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认知和主张,提升中国智慧在全球碳政治中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11月22日G20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的致辞指出,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面对全球气候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11]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指出,各国应该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国情和能力,最大程度强化行动,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12]2021年5月6日,习近平主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强调“中国将根据实际可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最大努力和贡献,愿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7]习近平主席在外

交场合对这些话语的强调和宣扬,既表达了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原则主张,又为全球气候治理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2. 首脑外交加强了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建构力

制度是国家把实力和资源转化为绿色战略能力的关键性媒介和路径,对制度的参与和建构程度直接关系到战略转化的实现程度。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制度建构力是通过中国对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核心的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参与、建构与影响等方面体现出来,而首脑外交是参与制度建构的重要路径。一方面,通过首脑外交,中国可以把自身的一些治理理念和方案直接注入制度之中。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巴黎气候会议并在开幕式发言中全面阐述了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指出巴黎大会要加强《公约》的实施,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巴黎协议应该着眼于强化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也要为推动全球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协议应该有利于实现公约目标,有效控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引领绿色发展;应该有利于加大投入,强化行动保障,发达国家要落实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应该有利于照顾各国国情,讲求务实有效。^[13]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充分表达了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模式、原则、路径及走向的主张和要求,对《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的后续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通过首脑外交,中国与其他大国如美国和欧盟分别签署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等文件,为巴黎气候大会的顺利召开、《巴黎协定》的签署及生效起到了积极的政治动员和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还通过首脑外交对《公约》外相关领域的制度建构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国际能源、国际投融资等相关领域。习近平主席在参加领导人气候峰会时明确承诺,“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14]这既是中国首次发布将经济增长与煤炭脱钩的强烈意图,也是中国首次提

出煤炭消费的峰值年。^[15]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大上明确表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做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承诺。鉴于中国的经济体量、能源消费状况及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力,中国的控煤限煤政策及海外煤电投资转向无疑会对国际能源转型和海外投融资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对相关领域的制度建构和改革产生重要影响力。

3. 首脑外交增加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道义力量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深层次来看,这种变局是传统发展范式的危机,肇始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传统现代化,以全球生态失衡和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全球性问题正是这种危机的显著标志。^[16]面对人类的共同危机,哪个国家能够为这些危机的应对和解决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理念和方案,哪个国家就将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人类的进步方面占据道义高地。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需要站在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和谋划相应的解决方案,应对范围、应对主体、应对思路和应对方式都必须要与我们正在遭遇的问题相适应,这也就是有关学者特别强调的解决全球性难题思维与路径的“配适性难题”。中国通过首脑外交正在大力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绿色发展方式正是对这种普遍危机的回应,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之道。

全球气候治理从本质上讲是以调和人与自然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的方式调和人与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无论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抑或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需要人类自身理念的转变。这既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和世界观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国际道义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这些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理念,将中华文化中优秀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相结合,越来越成为引领世界舆论脉动的热点词汇,不断形塑和推动着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发展和完善,从而大大增加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道义力量。

4. 首脑外交改善和优化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国际形象

如何让外界清晰了解和认知中国在应对气候问题上的努力和贡献是改善和优化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首脑外交,对中国碳中和目标进行强调和澄清,并对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政策及措施进行权威解读,以此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17]作为党和国家最高权威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国际社会的发言及承诺,无疑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碳中和政策行动的理解,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为和表现有明显的期待和认知,加大各国对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政策行动的了解和熟悉,增加对中国实践行动的信服度和认可度,进而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

通过首脑外交,中国积极向世界展示如何正确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并在绿色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必将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产生非常大的引领和示范效应。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施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合理和正确处理发展和减排关系的进程。如果能够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不仅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奠定坚实的内部基础,而且通过基于自身国情基础上合理处理发展和减排关系的成功经验,将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提供重要借鉴,进而大大改善和优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结语

全球气候变化依然在加速,亟需世界各国摒弃狭隘的国家私利,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来看待当前的气候危机。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于2022年4月4日正式发布。报告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强调将升温限制在1.5℃(2.7°F)左右需要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迟在2025年前达到峰值,并在2030年前减少43%;甲烷也需要减少约1/3。^[18]可以说,全球气候变化的巨大威胁已经使

世界各国站在了一个要么立即行动要么承受灾难的十字路口,如不立即在所有部门进行深度减排,全球1.5℃温升目标的实现将变得毫无可能。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危机叠加、风险加剧的时代,需要中国继续通过首脑外交等各种国际战略途径,更加有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便提升中国绿色战略能力,在更好地维护自身绿色发展权益和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更好地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行动之中,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当然,首脑外交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形态,虽然在塑造和提升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方面至关重要,通过首脑外交中国也切实提升了自身的绿色战略能力水平,但是,鉴于碳中和目标和行动几乎影响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与国家的经贸活动更是紧密相关,单纯依靠首脑外交来加强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存在很大局限性。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需要内在向度和外在向度的相互配合和支撑,需要从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予以积极推进。正如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对内,中国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外,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1]唯有如此,中国的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中国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碳政治博弈中更好地维护和拓展自身国家利益,才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朝着人类命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01).
- [2] 李慧明. 欧美气候新政: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及其限度[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32.
- [3] 张海滨. 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36.
- [4]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werEU plan[EB/OL]. (2022-05-18)[2022-10-31]. https://eur-lex.europa.eu/resource.html?uri=cellar:fc930f14-d7ae-11ec-a95f-01aa75ed71a1_0001_02/DOC_1&format=PDF.
- [5]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signing of H. R. 5376,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 [EB/OL]. (2022-8-16)[2022-10-3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8/16/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signing-of-h-r-5376-the-inflation-reduction-act-of-2022/>.
- [6] 凌胜利. 主场外交、战略能力与全球治理[J]. 外交评论,2019(4):1-31.
- [7] 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N]. 人民日报,2021-05-07(01).
- [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入分析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 扎扎实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N]. 人民日报,2022-01-26(01).
- [9] 吴志成,李冰. 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的中国视角[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9):6.
- [10] 王伟男. 试论中国国际气候话语权的构建[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1):6.
- [11] 习近平.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的致辞[N]. 人民日报,2020-11-23(02).
- [12] 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12-13(02).
- [13]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12-01(01).
- [14]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4-23(02).
- [15] Climate Action Tracker. China[EB/OL]. (2021-11-03)[2022-07-01].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china/>.
- [16] 李慧明. 百年变局下中国与世界的复合生态关系及中国的责任担当[J]. 教学与研究,2021(9):5-17.
- [17] 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2021-10-13(01).
- [18] IPCC. The evidence is clear: The time for action is now. We can halve emissions by 2030[EB/OL]. (2022-04-04)[2022-07-01]. <https://www.ipcc.ch/2022/04/04/ipcc-ar6-wgiii-pressrelease/>.

(责任编辑、校对:臧莉娟)

China's Summit Diplomacy and National Green Strategy Capacity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arbon Neutrality

XIAO Lanla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94*)

Abstract: The carbon neutrality trend set off by th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drives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Internationally,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eopolitical pattern reconstructions and changes. In this context, national green strategy capacity construction form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arbon political games of all countries. National Green Strategy Capability refers to a country's ability to maintain and expand its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with a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carbon politics. It is based on various available green resources, nat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inclu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China's summit diplomacy against this carbon neutral background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national green strategic capacity constructions. It greatly enhances China's green strategy capacity through various ways, namely,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increasing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morality, and improving and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With mankind being in an era of overlapping crises and intensified risks, it is vital for China to continually strengthen its own green strategic capac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variou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hannels. Detailed policies include more summit diplomacy and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mankind progress.

Key words: carbon neutrality; summit diplomacy; national green strategy capability

